

论关中在黄河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使命

任宗哲

摘要: 关中是一个能唤起整个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区域。群山之下由渭河冲积出八百里秦川,从史前文化到周秦汉唐时期创造出中国文化基因。在历史长河中,关中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发展时期。无疑,关中是黄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崛起与衰落的一个缩影。关中曾是黄河文化根脉所在地、华夏文明发源地、中国农耕文明重要发祥地、国家都城文化汇聚地。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中,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中,关中迎来了历史上极其重要的第四次崛起的契机。要将产生于关中的优秀黄河文化基因进行解码,并使它们成为新时代民族记忆和精神的文化标识,最终促使关中在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中复兴崛起。

关键词: 关中;黄河文化;文明摇篮;文化根脉;复兴崛起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2)02-0076-10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关中是这条河流上最璀璨的明珠之一。三千年历史文化沉积,以及一代代关中人薪火相传的文化遗产赋予华夏文化轴心地带璀璨的文明和自强不息的伟大生命。毋庸置疑,关中的兴衰是黄河文化兴衰的缩影。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中,关中承载着历史文化基因和文明兴衰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复兴与崛起是古老的黄河文化走向新生的象征和隐喻。

一、群山环绕的关中与文明兴衰之缩影

《禹贡》将关中划归为雍州旧壤,据天下之险要地势,有四塞之国、陆海之地美誉,面积约三万四千平方公里,是我国历史上开发时间较早、极其重要的一个人文地理区位。因所在地域原属于秦国,也称秦川。又因渭河横穿其间,有八百里秦川,或渭河平原之别名。关中之名初见于《战国

策》,然而究竟是哪四关能确定关中的地理范围存在较大争议。《关中记辑注》载:“秦,西以陇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间,是谓关中之地。东西方千余里,南北近山者相去二二百里,远者三四百里。南山自华岳,西连秦岭终南、太白,至于陇山。”^[1]在潘岳看来,关中东自函谷,西至陇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腴沃野千里。”^[2]关中即从今天宝鸡汧阳地区一直到黄河边上(即陕西与山西的分界线)。《史记·项羽本纪》写道:“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3]东晋徐广的集解是,关中处于“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4]之间。在徐广看来,关中最东部在函谷关,西部在散关。汉代时关中被称为三辅,汉代成书的《三辅黄图》云:“秦并天下,置内史以领关中。项籍灭秦,分其地为三:以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谓之三秦。”^[5]西汉的关中已包括今天陕北在

作者简介: 任宗哲,男,陕西千阳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区域发展。

内。“《汉书》卷一高帝纪颜师古注：‘治谓都之也，秦中谓关中秦地也。’《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集解引如淳曰：‘时山东为谓关中为秦中。’”^[6]也可知秦中曾是关中别名。至唐时设关内道（一个与“关外道”相对的行政区划），指函谷关或潼关的内外，与关中含义不尽相同，但大概相当，其范围东至黄河沿岸，西至祖厉河畔（发源甘肃境，流经甘肃会宁、靖远县境内的河流），北至阴山山脉，南达秦岭，包括今天商洛地区在内，地理范围明显大于今天的关中辖区。

民国初年关中正式作为地方行政区划名，当时设关中道（原中路道改设）、汉中道、榆林道，大约1926年底废除关中道。关中道曾辖长安、咸阳、兴平、临潼、高陵、鄠县、蓝田、泾阳、三原、盩厔、渭南、富平、醴泉、同官、耀县、大荔、朝邑、郃阳、澄城、白水、韩城、华阴、潼关、华县、商县、蒲城、雒南、柞水、凤翔、岐山、宝鸡、扶风、眉县、麟游、汧阳、陇县、郿县、淳化、长武、乾县、武功、永寿等43县。今天的关中范围包括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五市及杨凌区，西起宝鸡、东至潼关、北界北山、南达秦岭，东西长约360公里，南北宽30至80公里。

关中最著名的关隘当属函谷关。战国初期设关，地理位置在今天河南省灵宝市北王垛村，位于弘农河左岸崤函山地，以北隔河是中条山和王屋山，控制着穿行崤山北麓的东西方向通道。西汉时函谷关向东迁移300里，改设在新安县。一般把灵宝市的函谷关称为旧关，新安县的称作新关。函谷关地势陡峭险峻，山上柏林苍翠，故又名“松柏之塞”。潼关是继函谷关而起，位于函谷关西端的又一座重要关隘，为陕西东门户，东汉末年设关。据说因黄河自北而来，水激关山而得名，是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之地。在此地，黄河与华山之间的距离只有15公里，加之函谷关与潼关的新、旧两关山岭连绵、峰峦叠嶂，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因此潼关不仅是关中与中原地区陆路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遏控黄河和渭河水上的要塞，历来兵家必争，战火不断。散关又名大散关，位于宝鸡境内，有说此关是周朝散国的关隘，关名由此而来；也有因关城位置在大散岭上，以地命名

的观点。散关东临绝涧清姜河，西倚高峰，居于南北道路的最高处。关址遗迹清晰，南北两侧沿山古道历历可见。除关址墙墩外，还有人工凿成的劈山墙、小窑洞，以及传说中站岗放哨的乌纱石等，属于典型的山关，是关沟、关岭和关城的统一体。关沟以清姜河沟为天然通道，关岭是一道天然军事屏障秦岭梁顶，关城扼守汉中通往关中平原的南北通道，关楼上依稀留有古人镌刻的“古大散关”字迹。武关在今陕西和河南两省交界处的丹江之北，唐时武关位置标记在今丹凤与商南之间的武关河上，即今丹凤武关镇，亦称武关街、武关村。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中考论武关位置：“由商洛又东南经桃花驿，层峰驿，亦九十里至武关（今关），有武关驿。此关‘北接高山，南临绝涧’，为春秋以来秦楚交通主道上之著名关隘，西去商州一百八十九里，去长安约近五百里。”^[7]萧关是战国时秦国设于西北边陲的重要关隘，扼长安通往塞外及西北交通孔道，拱卫京师及关中地区，在今宁夏固原地区。

关中诸关形成层层设防，高屋建瓴之势。群关之下的关中则是一个以渭河为轴线的阶梯状槽谷，从南、北两山前往河谷中心，依次经过山麓洪积扇、黄土台塬和河流阶地。秦岭横贯东西，像一座庞大的屏障阻挡了南北来的气流，导致秦岭南北两侧山麓气候存在较大差异，形成南麓湿热，北麓干冷的气候特征。唐时王维的《终南山》云：“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重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8]诗中描绘了秦岭山脉绵延遥远、峰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多种景观。秦岭北麓山脉平缓，西部陇山岩壑高深，泾水两岸耸立九峻山、嵯峨山。泾渭二水横贯其中，水利灌溉使土地成为膏腴之地。渭水哺育了关中平原，历代关中的物质与文化精华均汇集在渭河流域中下游。另外，西域地区文化也沿着渭水向东传播，最后到长安落脚。丝绸之路是关中历史上唯一通向外界的经济与文化通道。黄河干流在关中只有132.5公里，从陕西渭南的合阳县百良直到潼关，流经合阳、大荔和潼关三县。泾河和北洛河是流经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两条黄河重要支流，因黄土高原上黄土堆积深厚，坡

度陡峭,草木植被稀少,水土流失问题非常严重。关中平原上还有“终始灞、浐,出入泾、渭、沔、镐(高)、潦、漓,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9]。沔河源出终南山丰谷、高冠谷、太平谷,自户县流入长安境内,挟漓而来的漓水至咸阳市境内入渭河。灞水原名滋水,源出蓝田县东南的秦岭山中,于白鹿塬东北汇于渭河。浐水是灞水支流,在少陵塬与白鹿塬间流淌,与樊川、御宿川并称长安三大川。众多河流为关中平原的水利灌溉提供有利条件,且在长安城内营造美丽城市水域风景。

关中的地理位置极其独特,西通陇右、南接巴蜀、北抵塞外、东连中原,真所谓地遏东西、兼控南北,有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在9世纪、10世纪之前的中国历史中,位于欧亚大陆东部的关中平原在文化史上可与欧亚大陆西部地中海及东欧平原、欧亚大陆西部伊朗高原等地在文化史上的地位相匹配。”^[10]从西周到唐代,关中与河洛地区互为表里,黄河文明就在群山环绕的关中平原与伊洛河冲积出来的洛阳盆地间徘徊往复。北洛河、渭河入黄处与西岳华山在关中平原东部构成“三河一山”华夏文明轴心地带,围绕在这个轴心地带周围的关中、豫西与晋南形成了黄河中游的金三角区域。六盘山与渭河流域的另一个地形单元天水盆地阻隔,关中与陇右形成关陇地区,历史上曾经产生隋唐时期的关陇军事集团,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从关中南越秦岭可抵达巴蜀,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是我国两个重要的粮食产地。由蓝田县沿汉水支流丹江,过武关至江汉平原,与我国南方连接在一起。关中优越的区位优势使得在此形成的黄河文化能够向四周扩散,最终融汇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中。

关中的政治、经济优势到唐末开始丧失。事实上,到唐代中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黄河流域,中国经济与文化发展开始由东西发展轴心向南北轴心转移。及至宋、明两朝国土收缩,陕西沦为西部边陲,关中地位也随之下降。宋代的永兴军路绝大部分地区属于今天陕西地域,也包括今天关中、陕南和陕北一些区域。关中虽然衰落了,但是北宋时创立于关中的关学却诞生了。元代时将京

兆(今西安)改名为“安西”,意味着古时繁华的关中已远离国家中枢,成为安定西部边陲的重镇。近代以来,我国经济以东南沿海发展为先,现代文化也由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推移到内陆腹地。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诸多抱有科学救国之心的学者到西北考察,将西行开始之地选定在陕西关中,在他们眼中关中乃是西北门户,而非中心区域。关中的衰落之势直到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才有所改观,一跃成为国家向西陆路发展的桥头堡;2018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建设西安国家中心城市;2019年9月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指出,将关中与河湟、河洛、齐鲁几个区域文化相提并论。毋庸置疑,关中曾是华夏文明的灿烂中心,而当中国被世界近代化进程抛弃时,关中发展停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关中的历史起伏是黄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崛起与衰落的缩影。

二、关中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摇篮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出:“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于黄河本身,它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个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11]黄河中游的东岸和北岸汾水流域是唐、虞文化的发祥地;南岸伊洛河畔是夏、商文化的肇始地;西岸渭水流域是周文化的发源地。它们分别对应着今天的晋南、豫西和关中地区,即以华山为核心,包括中条山周围、子午岭以南和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这里是中华史前文化的核心区域。事实上,这种观点在中国考古学界基本已达成共识。1959年,安志敏提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20世纪90年代后期,苏秉琦认为,从关中、山西、冀西北到西辽河流域形成的文化带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最重要根系。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对河南仰韶村正式发掘时提出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文化的观点。“据《中国文物地图册·陕西省分册》,目前全省已发现仰韶文化遗址2040余处,其中关中地区最

多,约占总数的60%。”^[12]仰韶文化前后历时2000年,是延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学文化,其主要特征是彩陶制作,因此也被称为“彩陶文化”。仰韶文化遗址在关中分布相当稠密,不仅规模较大,而且堆积层厚,延续的时间也相当长,主要集中在泾渭河和泔河流域,形成以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和史家为代表,关中东部华县和西部宝鸡为中心的遗址群,其中包括宝鸡北首岭二期遗址、下孟村遗址、北刘遗址,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宝鸡斗鸡台、华阴横阵村遗址。《西安半坡》提出:“仰韶文化的遗存在关中地区已经发现了四百多处,它们多分布于靠近河床的第一阶地上。这些地方土质肥美、适宜种植;距水源近,生活方便;而且地势较高,又无水灾之害,所以当时人乐意在此居住。”^[13]仰韶文化遗址的地理特征,一类是土丘式遗址,渭河以南较多,且多在河流中游两岸。另一类是在发育较好的马兰阶地上,多在渭河北岸黄土原地。第三类是泉源遗址。黄河文明就诞生在沿着黄河支流或更小支流,乃至泉源上。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及其附近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其所以在世界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这不仅由于它很早就被发现并开始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因为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有许多重要业绩都在这个期间被创造了出来。”^[14]仰韶文化出现时期正是中国原始农业发生之际,旧石器时代人类狩猎、捕鱼,以采集天然食物为生。进入新石器时代,人们对野生谷物加以种植驯化,原始农业就诞生了。仰韶文化时期农业重要作物种属很多,如今大多数被视为野草,只有少数经过长期驯化培植为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粮食作物。粟、黍、稷由于耐干旱、生长期短,先秦时一直是黄土高原上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并最先得到推广。渭水流域的人们能在关中平原上繁衍生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开垦了黄土,发明了粟作农业,从而获得了稳定的生活保证。此时中国农业生产赖以存在的村落也诞生了。20世纪50年代在西安浐河岸边发现的半坡文化村落是仰韶文化早期村落的代表,而在临潼姜寨遗址上发现的村落内部社会结构就已经比较完整了。姜寨遗址位于渭水及其支流临河交汇的三角地带,村落中心拥有一个约4000平方米,占

地面积20多万平方米的圆形广场。100多所房屋围绕其周围,居住区外还有防御的壕沟,村西南有烧制陶器的窑厂,壕沟外河东是成群的墓葬区。显然这是一处经过精心设计的早期农耕文明的村落遗址,也“唯有自始即是自我延续的村落定居农业,才能解释何以陕西渭水流域沿诸小河两岸仰韶文化遗址分布竟能如此密集;何以仰韶聚落的设计,不但有为氏族集会的中心大房子和其周围为居住而建的小房屋群,而且还有窖穴、陶窑和整齐的氏族墓地”^[15]。姜寨遗址出土文物近2000件,大多属于收割类的农具,可见关中史前农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

制陶术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另一个重要标志。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曾将制陶术的发明作为区别蒙昧与野蛮时代的标志之一。事实上,陶器的发明制作确实使人类摆脱了一定要在水源地才能饮水的地域限制,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一般而言,彩陶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彩陶是指在器坯表面绘彩,然后一次性烧成的陶器。如果还能在烧好的陶器表面绘彩,那便是彩绘陶了。黄土高原很容易找到制作泥质陶所需的第三纪红土和早期黄土,因此是彩陶制作的重要区域。彩陶制作的鼎盛时代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此时产生了人类社会发展或者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故此,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理解是深入阐释黄河文化发展的重要节点。苏秉琦曾讲道:“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分布中心在华山附近,这正和传说中华夏族的发生及其最初的形成阶段的活动和分布情况相像,所以,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是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这种花卉图案是土生土长的,在一切原始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华族及其文化也无疑是土生土长的。”^[16]庙底沟陶器上的花卉图案以玫瑰花为主,极有可能是中华民族最原始的图腾。

人们在渭水两岸创造了早期黄河文化,并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向东北影响到红山文化,向东影响到大汶口文化,向南影响到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向西影响到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至此,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就已不再局限

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而是具有了广阔的地理大空间。在2000年的历史进程中,它与周边其他地域的文明不断进行交流碰撞,不断吸收周围文化因素,同时又给周边文明以不同程度的影响,于是逐渐发展成为中华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为中华民族文化机体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关中农耕是黄河流域文化根脉

黄河流域的农耕生产及其衍生出的灿烂文化,具有母体作用。因为中国原始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黄河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初步物质基础。故而“有农业,然后人类的事物,乃能为无限制的扩充,人口的增加,才无限制,人类才必须定居。一切物质文明,乃有基础”^[17]。周代是黄河文化奠基的重要时期。周族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最早在郃(即今武功)时,后稷就教民稼穡,至今在关中杨凌还存有后稷祠、稼穡台等遗迹,及至公刘迁移到豳(在今天彬州市、长武、旬邑县)开始察地定居、移民垦荒。作为周人入岐之前的先周文化遗存,彬州市的碾子坡遗址证实了周人在公刘时期的活动样态。《诗经·豳风》描绘了关中北部泾河中游的旬邑、彬州市和长武一带的生产、生活状况,《诗经·大雅·绵》记载了古公亶父迁居周原的经过和生产生活情形:“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膴膴,萁茶如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18]诗歌展示出周人从杜水、沮水迁徙到漆水,再迁移到西岐山下,周原上坦荡,连苦菜都甜美,于是筑造屋室以安居乐业的图景。“疆场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稼,以为酒食。”^[19]《诗经·小雅·信南山》里描绘出终南山下的田地疆域整饬,黍稷种植茂密的面貌。黍是关中最早种植的农作物,西周时曾孙用它给大家酿酒。中国桑蚕生产也是最先在黄土高原上发展起来,后来因关中衰落,才在我国江南一带发展起

来。《诗经·七月》中描述了一个热闹在农村生产劳动场面。《诗经·大雅·柔桑》里叙述了由农耕而创立宗法,周公制礼作乐,宗法制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的家国同构结构。周人迁岐后发展了历法,在今天岐山凤雏村、扶风齐家村出土的文王时期甲骨,已有对月相盈亏的记录,并以月相纪日出现“既吉”“既魄”“月望”“既死”等月相用语。一般认为,周人重视农业生产,从而设立准确时间概念,以适用农业生产。

秦本是居于西戎的游牧民族,不断向东迁移发展。经过几代君主的励精图治,尤其是由秦孝公与商鞅主导的变法致使秦国强大起来,从而使关中摆脱了自西周衰落以来200年停滞不前的困境。秦国的迅速崛起首先在于农业的大发展。秦国修筑的郑国渠灌溉关中400万亩土地,使关中变为“天府之国”。西汉时关中开始大量使用铁犁,今天在西安、咸阳、礼泉都曾出土过铁犁壁。汉武帝推行“代田法”,氾胜之推行“区田法”,汉时关中新开凿漕渠、龙首渠、成国渠、灵轺渠、泮渠和白渠,关中五谷丰登,成为天下粮仓,因此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飞跃。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以至于辽阔的黄河流域“千里无人烟”“白骨蔽平原”,关中更是遭到空前的劫难。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到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共有360年的大分裂、动荡时期。及至隋唐,关中第三次崛起,经过均田制、府兵制,以及关陇军事集团的努力,关中再次崛起。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诗中云:“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20]可以想象唐时关中蚕桑业繁荣的景象,栽桑树养蚕,缫丝织帛带来了丝绸业的繁盛。据考证,唐时长安丝行种类繁多,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小彩行、丝帛行、丝锦彩帛行、总绵丝织行等门类众多,丝绸色泽也多样,“仅是红色,便有水红、绛红、猩红、银红、狸红、深红、浅红之别;黄色,又有淡黄、青黄、鹅黄、菊黄、金黄之异。至于图案,则有花卉、飞鸟、奔马、灵芝、牡丹……数不胜数,让人眼花缭乱,让人无法不喜爱”^[21]。唐时农业生产工具出现了先进的曲辕犁,以及灌溉功能比东汉翻车更好的筒车。于是,经过长期发展,到开元时关中第三次崛起。杜甫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千万家。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22]可见当时关中之富足。然而安史之乱致使大唐迅速走向衰败，关中也随着唐朝的衰亡走向没落。至此，从原始社会后期到唐朝灭亡，黄河流域形成了关中和关东两大经济中心区，即以关中平原为中心的西部产粮区和以黄河流域的华北平原为中心的东部产粮区。农业支撑着关中发展，使关中成为战略要地。

唐末之后，关中不仅失去国都地位，经济也衰败下来。持续千年的关中水利灌溉体系也残破不堪。清代龙洞渠拒泾引泉，大型农田水利工程萎缩。水利失修，加之自然灾害，导致1898—1901年陕西、山西等地连年大旱，引起严重饥荒，陕西关中1929年年馔更是惨痛的记忆。据陕西赈灾委员会主席邓长耀的《陕灾报告》，陕西省有200多万人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800多万人靠树皮、草根、观音土勉强维持生命。西安周边乡村已是一片荒地，“华阴、华州，渭南，渐渐地看到那田野荒芜的景象”^[23]。于右任在《陕灾述略》中写道：“杨部师长冯钦哉孙蔚如语我，伊部入陕后，西路扶风武功一带在其部下之兵士，以久役于外，请假回家省视。归后，不特不见父母，不见妻子，而且不见房屋，不见邻里者，不可胜计，多痛哭而返。此真天下之惨闻也。”^[24]这场灾难促成了关中泾惠渠的修建。我国近代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在杨虎城将军支持下修建“关中八惠”，其中以泾惠渠最为有名，然而仍不能摆脱军阀连年混战，社会生活凋敝，生产停滞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70余年发展，关中迎来第四次崛起。20世纪90年代，陕西学人王大华在其《崛起与衰落：古代关中的历史变迁》一著中自信地认为关中的第四次崛起必然到来，他认为：“关中是周、秦、汉、唐文化的发源地，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基，要选择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并使之新生、复兴，关中是最理想的地区。”^[25]八百里秦川坐拥着整个西北最丰厚的土壤、发达的水系，不仅是我国粮棉生产基地，如今还是我国重要的水果生产地，是全国人民的水果篮子。现代生态农业正在崛起，多种经营生产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每年春天关中平原上杏花、李

花、苹果花、桃花、梨花次第开放，到五月时节之后，灞桥的樱桃，阎良的酥梨，临潼的石榴，富平的柿子，大荔的西瓜，户县的葡萄，周至、眉县的猕猴桃，高陵的泾渭鲜枣，瓜果飘香。毋庸置疑，关中能较早步入文明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农业发展密不可分。土地的本性最根本地决定着文化的属性。黄土地上诞生的农业奠定了黄河文明的根基。

四、关中都城是古代黄河流域国家象征

关中的地理区位优势在于它是古代黄河文化发展的中心区域，而“黄河流域是文明的中心，具体说，是国家的中心”^[26]。中国古代的都城是国家政治统治、经济管理、军事控制和文化礼仪活动的中心。都城是一个国家的心脏地区，也是王朝政权象征和权力中心，更是国家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喻体。因此，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都对定都与建都非常重视。都城选址一般需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是天然仓库，粮食充足，以便满足首都庞大的人口需要；是交通枢纽，位于交通要道，便于人们往来于京都，又能自如去往全国各地；是军事要塞，便于防守，以保证国都长治久安。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黄河文明三千年，秦中自古帝王都，关中平原所建造的每一座都城（以及帝陵）都凝聚着自己所属时代的“国家主导文化”。

沿着渭水曾经先后出现西周之丰镐、秦之咸阳、汉唐之长安等都城，形成一个庞大的关中都市群。周文王在沔水之西建立丰京，武王在沔河之东建立镐京。丰镐二京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早期的聚落乃至早期都市都是循着河谷台地发展起来，城市设计因地制宜，比较朴素、自然而强调实用功能。20世纪40年代，有关丰镐二京的考古工作开始，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西周时期的丰镐轮廓呈现出来。“丰京位于丰水中游西岸，东界紧傍丰水，西至灵沼河，北极郡鄂岭岗地北缘，即今客省庄至张村坡一带，南到石榴村，方圆大约6—7平方公里。这一区域的客省庄、马王村、曹寨、新旺村、冯村、苗驾、石榴村、大原村、张家坡等地都是西周遗址和墓葬比较密集的地方。”^[27]周武王

自丰邑迁镐,甲子伐商,一统全国,王业大成,镐京在伐商战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秦都咸阳所处地势由北部地势高昂的咸阳原延展到渭河边上,现已发现20多处夯土建筑基址建成,后世称为渭城,在今咸阳市以东约10公里。秦始皇大兴土木,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北坡上建六国宫,迁徙天下12万户富豪于咸阳;在渭南又兴建了诸庙、章台、兴乐宫以及上林苑等;后期在上林苑兴建新的行宫阿房宫。经过一番经营,咸阳成为一座气势雄伟的庞大都城。汉人《三辅黄图》描述“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28]。现在位于西安市西北郊的汉长安城是西汉和新莽的都城。汉长安城南依龙首原,北临渭河,“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29]。汉武帝时将秦时建造的上林苑扩建,扩建后的上林苑东南至蓝田,西至周至、北跨渭河(包括今天的咸阳、兴平一带的秦汉离宫别馆),南至今天西安的长安区,面积辽阔,周围达300余里,千乘万骑纵横其间。

隋唐长安城是隋朝宇文恺按照《周易》六爻卦象修建,依据关中山川地势和周易儒教礼仪建造,由禁苑、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构成。从承天门到朱雀门再到明德门是长安城的南北中轴线,东西三条轴线,分别从开远门到通化门,金光门到春明门,延平门到延兴门,形成纵横交错的棋盘式格局。唐代鼎盛时期长安城是“天可汗之都”、东亚文化中心,是边疆少数民族、外国使节、留学生、商人汇聚地,占据着公元7至9世纪世界文明的制高点。唐人袁朗在其《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里写道:“复道东西合,交衢南北通。万国朝前殿,群公议宣室。……端拱肃岩廊,思贤听琴瑟。逶迤万雉列,隐轸千间布。”^[30]隋唐都城长安在中国都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确立了中国都城的里坊制度。日本学人妹尾达彦认为:“以隋大兴城和隋洛阳城的建造为契机,东亚各区域开始了相继建立国家和都城的时代。”^[31]公元7至8世纪是东亚国家积极建造都城的时期。这恐怕与唐王朝给相邻地域造成紧张感有关。为了能与唐王朝抗衡,加速建造国家都城的步伐,渤海国在8世纪营建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其中上京的龙泉府与日本的平城

京都是模仿长安城而建的都城。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古都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开封,唐之前十三个王朝建都长安,形成东西两京。五代至北宋是过渡时期,以洛阳、开封建都。从经济角度讲,唐末中国的政治格局就从东西轴转向南北轴,都城也在南京与北京之间移动。历史上这五大古都中西安和北京皆以形胜,位于中国内地和边疆的交界地域,也是历史上建都时间较长的都城。“特别是作为‘中国边疆’压力之下的、中国内地与边疆结合时期的都城,中国历史前半期中,长安最适合;后半中期,北京最适合。……而在北京之前,长安一直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32]

自宋以来,中国政治形势形成南北对峙关系,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经济中心却在南方。近代以来,政治局势变幻多端,西安的身份有些特殊。关于首都选址问题,存在着1912年、1927—1928年、1935年、1941—1943年、1946—1947年五次争论。1927年5月张其昀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国都之问题》是学术界第一次提出在南京建都;1928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白眉初教授在《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刊出《国都问题》,提出建都北京;贺昌群也主张建都北京,写出《论历史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胡焕庸主张建都武汉;钱穆主张首都建在西安,以北平为陪都。事实上,近代以来关中始终远离政治中心。

五、关中文化的复兴与崛起

周秦汉唐时期是黄河流域辉煌的关中时代。据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谓之字”^[33]。今天在陕西白水县有仓颉庙。无疑,一整套成系统的文字不可能由一个人完成,但是中国古代系统文字产生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从最早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到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全盛时期为西周时期。秦王朝“鉴于诸国都有自己的书写体系,秦政府发明了一套新的非字母简化书写规范,在全国通用”^[34],最后促成国家学术形成。基于文字,产生了中国

书法艺术。“关中是历代帝都名区，古碑丰富，为天下之冠。其中，长安一带，更被推为古碑的源藪。”^[35]唐文宗开成二年，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部经书勒于碑石，立于长安务本坊的国子监，这便是有名的开成石经。宋代大学士吕大忠建立碑林，奠定了今天碑林的基本格局。清初再刻《圣教序》与《淳化阁帖》，以及收藏中西交流史上极有价值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西安碑林早已成为中国文字文化渊藪地。耀州药王山内所藏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及民国历代石碑230余通。显然，从仓颉造字到半坡彩陶，再到周金秦篆、汉隶唐书，关中地域汉字及其发展过程记录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历程，是民族文化活化石，也对日本、韩国的文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个方块字像是一块土，连成国家山河。

关中的文学艺术蕴含着中华民族生命密码、国家历史和民族记忆。《诗经》里的《秦风》《邠风》《大雅》《小雅》等皆是反映陕西关中先民们生产、生活的诗歌，内含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丰富的农耕文明传统。司马迁的《史记》确立了中国史学纪传体写作范式与中国史传文学传统，汉赋唐诗彰显着恢宏壮阔的大国盛世气象，透显着海纳百川、昂扬进取的时代精神。关中是黄河流域文化原创地，在关中萌发周易、创立道教，确立儒家思想为国家思想，融化外来佛教为中国佛教。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创建的灿烂历史文化奠定中华文明基因，丰赡典籍记载着周秦汉唐时期创建的国家制度和宗教思想、文学艺术。张载是汉宋之学的枢纽性人物，他承孔孟、鉴释老，促使汉宋学术转型，道学精神独立；开启程朱理学、引领陆王新学，滋养气学，揭示天德内在生化，奠定儒家伟大功业。毋庸置疑，在关中文化母体中孕育了诸多具有世界文明价值的文化。关中是一个能唤起整个民族历史记忆、文化认同的人文地理区位。从西周到唐末三次崛起，又三次衰落。今天，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之际，我们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时代发展新现实对其不断创造性转化，从而创造出新文化。

近代以来，中国发展是从东南沿海伊始，继而推进到江浙、两湖一带，然后才进入内陆腹地。中国的现代化自始至终存在着地域差、时间差。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包括黄河中下游的渭河流域和部分黄土高原地区，历史上长期是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领先区域，但是从唐末至近代以来的千年时间里，由于中国经济与文化日渐南移而失去中心地位。当前，在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的重要历史时刻，关中迎来了黄河文化发展的第四次崛起。20世纪90年代，关中第四次崛起的时间尚且不明确。新时代赋予了关中发展的新契机。纵观中国历史，从西周至秦，中国完成了北方、东部和西部地域的国土开发；秦汉至元代，国土开发方向主要在南方；在南北对峙时期，中国国土开发开始转向西部，这种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态势遗留至今。近年我国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五大战略，全面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每个战略都担负着各自不同的时代使命。在笔者看来，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是一项针对中国北方发展的国家战略。当代中国只有各个区域都发展起来了，才能真正称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诚然，“在复兴传统文化合理内涵方面，关中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正是关中独具的长处，是希望所在”^[36]。故此，要构建以文化力量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新格局，就要对产生于关中的黄河文化进行基因解码。所谓中国文化基因是指具有原创性，并深远影响后世文化发展的文化因子。关中拥有丰赡的黄河文化与中国文化基因，要通过解码文化基因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奠定基础，最终通过建设关中文化标识来推动关中文化在新时代的复兴。所谓文化标识建设是一种符号建设工程，即要选择关中大地上具有国家自然标识、中华文化发源地、农耕文明发祥地、都城发展历史脉络的文化及其景观，凸显黄河文化的关中特色，为此要对关中文化进行提炼，积极对其进行从文化基因到文化标识的转化与构建。

第一，彰显黄河文化的地位，创建一条关中东黄河文化的历史轴线。将关中史前文明重要遗址勾连起来，展示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轴线。以文明曙

光为题,连接蓝田猿人、大荔人沙苑、半坡文化遗址、姜寨、华夏老官台遗址;以文明肇始为题,贯穿白水仓颉庙、黄帝陵、炎帝陵,以上遗址要做好数字资料建设与视觉文化展示。

第二,突出关中农耕文明根脉性,加强村落、水利灌溉系统文化研究与阐释。其一,打造农耕文明发祥地后稷台与杨凌农业示范区。其二,特色名村落文化发掘与展示。关中大地上著名村落很多都带有文化符号。蓝田王维辋川是中国田园诗与秦岭山水文化涵养之地;三原柏社村是有1600多年历史的关中台塬区民居地坑院群落,有“见树不见城,见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南有兵马俑、北有地坑窑”之称。铜川陈炉是千年耀州瓷生产基地、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韩城的党家村是典型明清民居,拥有近700年历史,是生活、生产、防御相结合的古村落;袁家村是一个传统乡村生活体验地,“袁家村”品牌进入城市开创了庞大的销售市场,乡村旅游又解决了农民就业问题。其三,建立农业水利遗产郑国渠古灌区遗址、秦汉隋唐的漕渠遗址、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等关中古水利遗产群落与现代宝鸡峡水利枢纽展示区。

第三,突出国家中心城市的中心地位,从古都现代化角度做好现代中国阐释与研究。2018年西安擢升为第九个国家中心城市,近年来在城市空间、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综合枢纽中心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国家级区域建设等方面都已取得显著成效。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开启我国陆海双驱动发展格局,西安及关中的地位开始提升。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今日之西安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国际化大都市气象。浐灞两河四岸聚集了多个国家级工程,奥体中心是其中璀璨的明珠。沿着这条国际水岸依次是华夏文旅公园、国际会展中心、圆桌会议中心和正在兴建的新陕西历史博物馆,在它们的对面则是浐灞国家湿地公园、广运潭等西安重要新地标。河湖城构成西安旖旎秀丽的山水田园风景。西安现已开发南湖公园(曲江池遗址)、汉

城湖遗址、斗门水库(昆明池遗址),在古遗址基础上建成城市公共空间。空中枢纽、地铁和高铁的崛起是西安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不断扩建,空港新城是全国唯一一个具有航权、自贸、保税、跨境、临空、口岸优势,将成为集航空、高铁、城际、地铁和高速等为一体的超级交通枢纽。西安地铁以全国12位长度,客流强度位于全国城市第5位。14条地铁线路打开西安城市交通发展的新局面,预示着城市发展速度大幅度提升。

一个古老的自然历史人文区域要复兴、崛起,需要我们知道它的过去,了解它的现在,掌握它的未来。关中在三千年黄河文化发展中经历了跌宕起伏,今天在民族复兴之旅上要发挥其文化引领作用,要将优秀的、具有全国意义的文化基因进行深度解码、解读,要创造性地进行转化,要及时、认真对当代关中文化进行提炼、深化,在中华民族发源地、中国农耕文明发祥地、古都文化汇聚地上充分彰显黄河文化的关中特色。

参考文献

- [1] 刘庆柱.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7.
- [2] 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462.
- [3] 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17.
- [4] 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17.
- [5]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1.
- [6]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7.
- [7]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0.
- [8]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424[M].北京:中华书局,2018:6266.
- [9] 袁行霈.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7:257.
- [10] 妹尾达彦.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M].高兵兵,郭雪妮,黄海静,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35.
- [11]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
- [12] 许顺湛.陕西仰韶文化聚落群的启示[J].中原文物,2020(4):7-13.
- [13] 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M].北京:中华书局,2017:102-103.

- [14] 侯仁之. 黄河文化[M]. 北京:华艺出版社, 1994:92.
- [15] 何炳棣. 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M]. 北京:中华书局, 2017:5.
- [16] 苏秉琦. 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J]. 考古学报, 1965(1):51-82.
- [17] 吕思勉. 中国通史[M].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6:182.
- [18] 周振甫. 诗经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19:415.
- [19] 周振甫. 诗经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19:358.
- [20] 彭定求, 等. 全唐诗增订本:卷30[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1712.
- [21] 王蓬. 从长安到罗马:汉唐丝绸之路全程探行纪实[M].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34-35.
- [22] 彭定求, 等. 全唐诗增订本:卷30[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2328.
- [23] 张恨水. 燕归来[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3:167.
- [24] 陈元方. 关于“民国十八年大旱”的一份历史文献资料[J]. 灾害学, 1987(2):84-85.
- [25] 王大华. 崛起与衰落:古代关中的历史变迁[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264.
- [26] 唐晓峰. 文化地理学释义[M]. 西安:学苑出版社, 2012:109.
- [27] 卢连城. 西周丰镐两京考[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88(3):84-85.
- [28] 何清谷. 三辅黄图校注[M].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6:27.
- [29] 何清谷. 三辅黄图校注[M].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6:75.
- [30] 彭定求, 等. 全唐诗增订本:卷30[M]. 中华书局, 1999:432.
- [31] 妹尾达彦. 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M]. 高兵兵, 郭雪妮, 黄海静, 译.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7:2.
- [32] 妹尾达彦. 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M]. 高兵兵, 郭雪妮, 黄海静, 译.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7:13.
- [33] 柳诒徵. 中国文化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27.
- [34] 陆威仪.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M]. 王兴亮, 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53.
- [35] 足立喜六. 长安史迹研究[M]. 王双怀, 谈懿成, 贾云, 译.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3:309.
- [36] 王大华. 崛起与衰落:古代关中的历史变迁[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266.

On the Position and Mission of Guanzho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Yellow River Culture

REN Zongzhe

Abstract: Guanzhong (Central Shaanxi) is an important natural, cultural, and geographic area which arouses the Chinese nation's historical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As an alluvial plain formed by the Wei River along mountains, the vast Guanzhong Plain has been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From prehistoric Yangshao culture to the Chinese cultural genes created in the Zhou, Q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over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3,000 years, Guanzhong has experienced three cycles of ups and downs. Guanzhong is doubtlessly a microcosm of Yellow River culture and even Chinese culture which wax and wane. Guanzhong is known as the home to the root of Yellow River culture,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 major sourc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a center of national capital city culture. Today in the new era, on the Chinese nation's great rejuvenating journey, with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Guanzhong embraces its fourth crucial opportunity to rise. The glorious Yellow River cultural genes that originate in Guanzhong need to be decoded and transformed into new-era cultural signs with national memory and spirit, thus facilitating the rejuvenation of Guanzhong in the national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Guanzhong; Yellow River culture; civilization cradle; cultural root; rejuvenation